



司马光治平社会建设思想研究

——《资治通鉴》史论解读

黄金铸 著

 凤凰出版社

司马光治平社会建设思想研究

——《资治通鉴》史论解读

黄金铸 著



凤凰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司马光治平社会建设思想研究：《资治通鉴》史论
解读 / 黄金铸著. — 南京：凤凰出版社，2013.3
ISBN 978-7-5506-1723-0

I. ①司… II. ①黄… III. ①史学理论—中国—古代
IV. ①K092.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16493号

- 书 名 司马光治平社会建设思想研究
——《资治通鉴》史论解读
- 著 者 黄金铸
- 责任编辑 汪允普
-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凤凰出版社(原江苏古籍出版社)
发行部电话025-83223462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邮编:210009
-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邮编:210009
- 出版社网址 <http://www.fhcbss.com>
-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 照 排 江苏凤凰制版有限公司
- 印 刷 扬中市印刷有限公司
扬中市科技园区东进大道6号,邮编:212212
- 开 本 880×1230毫米 1/32
- 印 张 17.125
- 字 数 430千字
- 版 次 2013年3月第1版 2013年3月第1次印刷
-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06-1723-0
- 定 价 58.00元
- (本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电话:0511-88420818)

自序

《资治通鉴》的 218 篇史论萃集了司马光及 35 位前贤对千年历史兴衰治乱规律的智慧总结,所反映出的社会治理思想丰富而多彩。《通鉴》史论皆有感而发,因事出论,绝无凿空立论、无病呻吟之弊,并高度统一于治平社会建设之主线,体现出强烈的史鉴意识和经世致用精神。其立策三术、为政八真、人本思想皆跃动着烁古耀今的智慧华彩。

司马光治平社会建设思想是中国思想史上的宝贵财富,具有良好的整体性和系统性,具有朴素的以人为本精神和重礼尚德特点。同时,它还表现为一个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的过程,它正视历史,直面黑暗,重微崇谏,以远谋为立论出发点,以务实为立论归宿,区分轻重缓急处理社会矛盾,追本溯源,穷探社会治理根本之道。苟能躬行并落实之,则政治别一景象,而社会清朗如绘矣。故其思想值得深入发掘和借鉴。

司马光所处的北宋中期,是社会矛盾逐渐激化、宋初以来治平之世式微的时期。当时,赵宋王朝已是每况愈下,“天下未尝一日无事”^①，“积贫积弱”的国势已经铸成。王安石变法,用非其人,执行不利,本欲利国利民,却时常转为害民渊藪。司马光一本其治平

^① 司马光:《传家集》卷二十《陈三德上殿劄子》,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社会建设思想,旗帜鲜明地反对并最终废止了王安石新法。姑不论其矫枉过正处及长期影响如何,至少在当时还是迅速赢得了“今日再升平”^①的和谐局面。

司马光的个人阅历和治史求鉴的思想,使之尤为重视对“关国家兴衰,系生民休戚”^②的“治乱之迹”^③的探索。历史及现实均表明,致乱之因多样,或以政治黑暗、君昏臣贪,或以用非其人、奸臣当道,或以经济凋敝、民不聊生,或以法令苛烦、残民害政,或以穷兵黩武、国无宁日,或兼而有之。致治之道则高度一致,君明臣忠,四民安业,崇礼尚德,政治清明。故司马光思想之核心与总归乃治平社会建设,其重要内容则包括人本思想、以礼治国思想、用人思想、法制思想、经济思想、军事思想、文化思想等。

“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日损则归于要旨,得其精华矣。司马光《进〈通志〉表》曰“治乱之原,古今同体”^④。探寻治乱之道,以至简至约为化境,司马光思想正可约归为“治平社会建设”六字。

① 朱熹:《宋名臣言行录》后集卷五《吕海》,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② 司马光:《传家集》卷十七《进〈资治通鉴〉表》,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③ 司马光:《传家集》卷十七《谢赐〈资治通鉴〉序表》,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④ 司马光:《传家集》卷十七,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目 录

自 序	1
导 论	1
一 研究背景	1
二 相关研究综述	12
三 研究内容与方法	35
四 研究意义与创新	40
第一章 司马光治平社会建设思想综论	42
第一节 司马光的综合社会治理观	42
第二节 司马光以人为本的社会治理思想	59
第三节 常规治国思想	76
第四节 守成与治乱思想	91
第五节 人君治国之道	101
第二章 司马光的以礼治国思想	111
第一节 纪纲名分制度规范之礼	113
第二节 道德规范之礼	121
第三节 行为规范之礼	130
第四节 礼之治国作用	171

第三章 司马光的用人思想	176
第一节 人才区别与辨实思想	176
第二节 重要的用人思想	200
第三节 人力资源管理思想	231
第四节 特予强调的几种用人之失	250
第四章 司马光的法制、经济和军事思想	266
第一节 法制思想	266
第二节 经济思想	314
第三节 军事思想	328
第五章 司马光的文化思想	351
第一节 学术文化史观	351
第二节 通变史观	375
第三节 天命史观	394
第四节 忠文化观	416
第五节 隐文化观	435
第六节 谏文化观	439
第六章 司马光治平社会建设思想探源	462
第一节 由司马光的阅历探寻其思想来源	462
第二节 由司马光的著作探寻其思想来源	500
第三节 由《通鉴》取材标准和著述目的探寻其思想来源	520
参考文献	525
后 记	541

导 论

一 研究背景

(一) 司马光及《资治通鉴》在中国历史上享有隆崇地位

司马光(1019—1086),初字公实,号迂夫,后更字君实,晚号迂叟。生于宋真宗天禧三年,死于宋哲宗元祐元年,享年 68 岁。陕州夏县(今属山西省夏县)涑水乡人,世称涑水先生。追赠太师、温国公,谥文正。故后世又常以温公、温国公、温国文正公尊称之。

司马光是北宋著名的政治家、史学家、文学家,历仕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四朝。其为人质朴醇厚、温良谦恭,为官刚正不阿、忠清爱民,为学严谨致用,尤长史学。其人格堪称儒学教化之典范,其《资治通鉴》堪称中国文化之瑰宝。

《资治通鉴》是我国古代历史上第一部编年体通史巨著。全书 294 卷,300 余万字。其记事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 403),下迄后周显德六年(959),涵盖了周、秦、汉、魏、晋、宋、齐、梁、陈、隋、唐、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 16 个朝代 1362 年的历史。成书之日即受到宋神宗嘉评,此后一直倍受历代帝王、名臣和学者推崇。

宋神宗盛赞《通鉴》说:“前代未尝有此书,过荀悦《汉纪》远

矣。”^①宋高宗说：“读《资治通鉴》，知司马光有宰相度量。”^②宋代学者中，洪迈曾手抄《通鉴》三遍，张仲隆以“通鉴”名其书斋，王应麟为《通鉴》撰《答问》，并称“自有书契以来，未有如《通鉴》者”。^③倪思将《通鉴》和列群经之首的《周易》相提并论，说：“《易》以明天地万物之理，《通鉴》纪治乱兴亡之迹。推其理而知其盈虚，考其迹而究其得失，是其学也有用，其于用也，斯为有益。予昔之学贪多务得，余今之学捐华摘实。手此二书，朝夕绌绎，迨其久也，怡然理会，涣然冰释，寂然不动，退藏于密。”^④南宋著名理学家朱熹说，“温公之言，如桑麻谷粟”，^⑤须臾不可或缺。对《通鉴》的尊崇，已近乎神化了。宋末元初胡三省说：“为人君而不知《通鉴》，则欲治而不知自治之源，恶乱而不知防乱之术。为人臣而不知《通鉴》，则上无以事君，下无以治民。为人子而不知《通鉴》，则谋身必至于辱先，作事不足以垂后。乃如用兵行师，创法立制，而不知迹古人之所以得，鉴古人之所以失，则求胜而败，图利而害，此必然者也。”^⑥元初设兴文署刊刻诸经子史，“以《资治通鉴》为起端之首”。^⑦明代胡应麟认为，“自司马之为《通鉴》也，汉、唐而上昭昭焉；自《通鉴》之止司马也，宋、元而下泯泯焉”。^⑧明末清初顾炎武说：“宋人

①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百五十，中华书局 1990 年版，第 8390 页。

② 张端义：《贵耳集》卷上，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③ 王应麟：《困学纪闻》（全校本）卷十三《考史》，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1559 页。

④ 倪思：《经钜堂杂志》卷二，《续修四库全书》影印明万历潘大复刻本。

⑤ 朱熹：《朱子语类》卷一百三十，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⑥ 胡三省：《新注〈资治通鉴〉序》，《资治通鉴》卷首，中华书局 1956 年版。

⑦ 《兴文署新刊〈资治通鉴〉序》，《资治通鉴》卷首，中华书局 1956 年版。

⑧ 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十三《史书占毕》，中华书局 1958 年版，第 179 页。

书如司马温公《资治通鉴》……以一生精力成之，遂为后世不可无之书。”^①清代著名史学家王鸣盛高度评价《通鉴》：“此天地间必不可无之书，亦学者必不可不读之书也。”^②《四库全书总目》也称赞《通鉴》“网罗繁富，体大思精，为前古之所未有”。民国初年，梁启超认为：“《通鉴》亦天地一大文也。其结构之宏伟，其取材之丰赡，使后世有欲著通史者，势不能不据为蓝本，而至今卒未有能愈之者焉。温公亦伟人哉。”^③又说司马光《资治通鉴》“简繁得宜，很有分寸，文章技术不在司马迁之下”，^④并可称我国史学界前后“两司马”。近人陈寅恪在其《唐代政治史述论稿》自序中说：“夫吾国旧史多属于政治史类，而《资治通鉴》一书，尤为空前杰作。”岑仲勉在其《通鉴隋唐纪比事质疑》自序中说：“《资治通鉴》是我国极负盛名之通史，论到编纂的方法，史料的充实，考证的详细，文字的简洁，综合评论，确算它首屈一指。”^⑤金毓黻在其《中国史学史》中说：“所谓剥肤存液，取精用宏，神明变化，不可方物者，非《通鉴》一书不足以当之，此所以为冠绝古今之作也。”^⑥柏杨译《资治通鉴》一经问世，便荣获 1983 年度台湾地区“最具影响力的书”，其序云：“在中国浩如烟海的史籍中，事实上只有两部才是最有价位的著作，一是司马迁先生的《史记》，另一部是司马光先生的这部《资治通鉴》。”由此可知，《资治通鉴》在当时及后世均获得了很高的评

① 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卷十九《著书之难》，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1084 页。

② 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一百，上海书店 2005 年版，第 932 页。

③ 梁启超：《新史学》，《梁启超史学论著四种》，岳麓书社 1985 年版，第 245 页。

④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304 页。

⑤ 岑仲勉：《通鉴隋唐纪比事质疑》，中华书局 1964 年版。

⑥ 金毓黻：《中国史学史》，商务印书馆 1999 年版，第 248 页。

价,在我国史学发展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资治通鉴》是一部简明翔实的编年史,它在历史编纂学方面取得了诸多重要的成就,为后世史家提供了宝贵的典范。

《通鉴》集合了个人修史与史馆修史之长,既有史馆制度下集体合作与中央财力、物力支持的优势,又不同于唐代史馆制度下重臣领衔、众人同修的格局,助手仅负责搜集资料、编纂长编,而审定成稿则完全出自司马光一人之手。这样的安排使得《通鉴》不仅体例严谨、脉络清晰,而且文字风格前后一致,如出一人之手。这也成为《通鉴》备受后世推崇的重要原因。

《资治通鉴》取得了辉煌的史学成就^①:

1. 网罗宏富,细大不遗

《资治通鉴》向以史料充实、考证精详著称。司马光《进〈资治通鉴〉表》云:“遍阅旧史,旁采小说,简牍盈积,浩如烟海。”可见其搜集材料之广。

据考,《通鉴》丛目及长编的取材极其广泛,司马光提出了“宁失于繁,毋失于略”的原则,所收史料除正史之外,诸如稗官野史、百家谱录、总集别集、传状碑志等尽收其中。南宋高似孙对《通鉴》引征书目所做的统计认为,除了“正史”以外,仅杂史就有 222 种之多。但后人的考证不断突破这一数字,现多数学者认为达 300 余种^②,6500 多卷,3000 多万字。其实,《通鉴》行文,通例不记出处,仅于记事互有出入时,方陈列众说,考辨真伪,择信而从,因而许多书目今已无法考知了,《通鉴》征引书籍远不止此数。

^① 参李昌宪《司马光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397—410 页;张志哲《中国史籍概论》,江苏古籍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340—348 页。

^② 按,陈光崇《张氏〈通鉴学〉所列〈通鉴〉引用书目补正》考得 359 种,高振铎《〈通鉴〉参据书考辨》考得 339 种,两文均载《〈资治通鉴〉丛论》,河南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

最早论及《资治通鉴》引用资料的是司马康,他指出:除 19 部正史外,编写楚汉时期历史,引用过荀悦的《汉纪》、袁宏的《后汉纪》、司马彪的《续汉书》;编写南北朝时,引用过北魏崔鸿的《十六国春秋》、梁朝萧方等的《三十国春秋》及《太清记》、《建康实录》等书;唐代以后,保存下来的史料越来越丰富,对稗官野史、各家谱录、正集别集、碑碣墓志、行状别传也不敢稍有忽视。其中尤其重视柳芳的《唐历》,其书记叙了隋恭帝义宁元年(617)至唐代宗大历十四年(779)的历史,司马光将其撷取殆尽。南宋著名学者洪迈考证,就唐一代而言,《通鉴》叙述隋末王世充、李密事用《河洛记》,魏征谏诤用《谏录》,李绹奏议用《李司空论事》,叙安史之乱中张巡等坚守睢阳事用《张中丞传》,李愬平淮西用《凉公平蔡录》,李泌事用《邺侯家传》,李德裕处理太原、泽潞、回纥事用《两朝献替记》,大中时吐蕃尚婢婢事用林恩《后史补》,韩偓凤翔谋画用《金銮密记》,平徐州庞勋用《彭门纪乱》,讨浙江裘甫用《平剡录》,记扬州毕师铎、吕用之事用《广陵妖乱志》,采摭丰博,不弃稗官、野史等。^①司马光早在编纂之初就明确告知助手:国家组织编写或认可的“实录”、“正史”,未必皆可据,民间流传的杂文、小说亦未必皆无凭,当择善而从。故《资治通鉴》向以取材广泛、网罗宏富见称。北宋仁宗时成书的《崇文总目》,是当时最权威的目录书,但《通鉴》所征引之书,有相当一部分是其所未登录的。

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资治通鉴》取材广泛的特点,也得到了愈来愈多的证实和认可。总体上看,《通鉴》秦汉部分没有多少今人未见的新资料,而魏晋南北朝部分所用的资料已有约十分之一不见于现存其它史籍,唐五代部分的史料,则约有半数仅见于《通鉴》,而被其征引的这些书籍今多已亡佚。如此,《资治通鉴》一书

^① 参洪迈《容斋随笔·容斋四笔》卷十一《册府元龟》,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743 页。

所保存的史料便显得格外珍贵了。

2. 考订精当, 启迪后学

对文献的辨伪考异工作, 古已有之。早在春秋时期孔子的学生子贡就怀疑过历史文献的真实性, 他认为纣不像文献记载的那样罪大恶极。孟子也说过“尽信书, 则不如无书”。司马迁作《史记》时, 已明确提出了“考信于六艺”的原则, 即对儒家奉若神明的经典持怀疑态度, 要认真进行去伪存真的考证工作。裴松之为《三国志》作注, 除广泛搜集史料以补遗阙、备异闻外, 对于“纰缪显然, 言不附理”的记载也都有所论辨, 并加以矫正。唐代杜佑编纂《通典》, 每于小注中考订史料之真伪。但这些都不可与司马光的考异工作相提并论。我国史学中真正严格意义上的考异法是由司马光创立的, 《通鉴考异》是我国第一部考史专著。南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 清代徐乾学《资治通鉴后编》、毕沅《续资治通鉴》、夏燮《明通鉴》等编年体著作皆采考异法订正史事, 虽然成就各异, 但均有所创获。清代盛极一时的乾嘉学派也以考据见长, 其代表人物钱大昕、王鸣盛、赵翼所作《二十二史考异》、《十七史商榷》、《廿二史札记》, 皆考据学的名作, 无不深受《通鉴》考史方法的影响。今日考史, 就具体方法而言, 亦大致不出其规模。如王永兴在其《陈寅恪先生史学述略稿》一书的目录中, 就明确列出“陈寅恪先生史学主要渊源于司马光欧阳修为代表的宋贤史学”和“陈寅恪先生继承并发展宋贤长编考异治史方法”的标题。足见《通鉴》对后世史学影响之深。

《通鉴》取材广泛, 一事往往参据三四种乃至十数种史料编撰而成。这方面的成就集中体现于其《资治通鉴考异》中。凡遇来源各异、相互抵牾的史料, 必先考其异同, 而后去伪存真。如《通鉴》记安史之乱中颜杲卿倡义河北一事, 全文不过四百余字, 而引用《河洛春秋》、殷亮《颜杲卿家传》、《玄宗实录》、《肃宗实录》、《唐历》、《旧唐书》、《颜氏行状》等史书凡 7 种, 考辨颜杲卿起兵反抗安

禄山的史实,全文长达 2573 字。此外,对王世充巩北之败,安禄山丧师之赦,李仲言之见用,杨嗣复、李瑒等之贬等,司马光所出考证文字也都在千言以上。

研究显示,仅《通鉴·唐纪》部分,司马光就根据实录和杂史诸书指出《旧唐书》不妥之处约 378 处,《新唐书》不妥之处 197 处,用《长历》纠正“正史”年月日错误 80 余处,用《唐历》纠正“正史”不妥之处亦不下 70 处。由此可见,司马光所说编修《通鉴》“抉摭幽隐,校计毫厘”,诚不诬也。因此,《资治通鉴》的史料比起十七史来更为可靠。南宋高似孙说“不观正史精熟,未易决《通鉴》之功绩也”,^①对《资治通鉴》而言,是恰如其分的。

3. 秉笔直书,叙事平实

《通鉴》的长处之一,还在于它能比较客观地记述历史事件。以往的历史学家们出于维护封建伦理道德与统治的需要,在编写历史时,往往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任情褒贬,还硬将一些王朝定为正统,一些王朝定成伪政权。司马光对此则不以为然,他认为一名对历史负责的史学家,应具备超脱通达的态度,“据其功业之实而言之”,主张历史学家在编写历史时应“止欲叙国家之兴衰,著生民之休戚,使观者自择其善恶得失,以为劝戒”,“无所抑扬,庶几不诬事实,近于至公”。^②即史家的责任在于客观地记述历代王朝的兴亡盛衰和人民群众的喜怒哀乐,如此方不至歪曲历史;而政治之成败与人物之臧否,一由读者去评判,并从中吸取经验教训。

《通鉴》是一部为统治集团提供借鉴的书,为了突出其“劝戒”作用,司马光在《通鉴》中对历史上的黑暗统治与统治阶级的骄奢淫逸作了大量的揭露,记录了许多昏君,对历史上杰出的帝王如汉

① 高似孙:《纬略》卷十二《通鉴》,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② 《资治通鉴》卷六十九,中华书局 1956 年版,第 2187 页。

武帝、魏孝文帝等，也在肯定其历史功绩的同时，毫不留情地指出其过失。

4. 创编年体史之典范

编年体乃《史记》开创纪传体前中国古史之正体，以《左传》为其代表。随着大一统的实现和历史事件的日趋繁复，其固有的诸多不足日渐凸显出来。刘知几《史通》评曰：“论其细也，则纤芥无遗；语其粗也，则丘山是弃。”既不利于完整而集中地叙述人物与史事，也不便于将不同性质的史料区分记录。于是，司马迁创立了纪传体，此后历代因之，成为中国史体之主流。但纪传体亦有其弊端，它“同为一事，分在数篇，断续相离，前后屡出……编次同类，不求年月，后生而擢居首帙，先辈而抑归末章”。^①章学诚《文史通义》云：“合纪传之互文，而编次总括乎荀、袁，司马光《资治通鉴》作焉。”^②

《通鉴》之编年较《左传》之编年有了重大的发展，它以正史“本纪”为经，以“传”为纬，将“志”之大端编入相应之年，又充分运用追叙、插叙以及人物首出交代籍贯、世系等编纂书法，较好地将纪传、编年之优点萃于一炉。而《通鉴》的姊妹篇《通鉴目录》又可视为“表”的演化。如此，《通鉴》便理所当然地成了编年史的典范之作。自《通鉴》问世以来，被冷遇了千余年的编年史体重现辉煌，宋、元、明、清各代，续《通鉴》之书，继踵而出，呈争奇斗妍之势。其中袁枢所作《通鉴纪事本末》，又开创了纪事本末体。梁启超认为“纪事本末”体与近代流行的章、节、目体最为接近。就史体而言，至赵宋之世，纪传、编年、纪事本末鼎足而三之势成。然探本究实，则《通鉴》

^① 刘知几著，浦起龙通释：《史通通释》卷二《二体》，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25页。

^② 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卷四《释通》，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73页。

已囊括古今史籍各体于一帙,对中国三大史体之形成与发展具有突出的承上启下作用。

司马光及其《通鉴》,在今人思妃主编的《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100名人》和张秀平、王晓明主编的《影响中国的100本书》中,均赫然入榜。

(二)《通鉴》研究与其影响和地位不相匹配,其史论研究尤为薄弱

司马光及其《资治通鉴》在中国历史上的影响和地位鲜有比肩,不容忽视。新中国成立以前,尤其是长期的封建社会时期,人们对司马光及《通鉴》的重视程度,可谓丝毫不逊色于司马迁及其《史记》。然而,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史学界对两司马的评价及研究却出现了颇大的差异,司马光及《通鉴》研究明显滞后于司马迁及《史记》研究,相关研究成果亦呈现出前者明显少于后者的现象,而且,对司马光思想所持批判继承态度中的批判成分浓重。

事实上,无论是从史料之丰富、考订之精密、组织编纂之严整有序、文字学及史学功力之深厚,还是从社会经济文化之发达程度、史书编纂人力与财力投入之多寡、帝王支持度等编纂的外部条件考察,司马光及《通鉴》均无理由逊色于司马迁之《史记》。惟其时代不同,社会矛盾有异,司马迁修史于封建制度远未完善,汉武帝积极进取而国力日益凋敝、民怨渐深、社会矛盾日趋尖锐,并与文景治世形成鲜明反差之时,而司马光则修史于封建制度日臻完善,和谐稳定成为社会发展主旋律之际,社会弊端与矛盾之解决,关键在于完善封建制度及秩序的贯彻执行,而不涉及封建制度及秩序本身的根本改变。故前者更多地体现出历史批判精神,后者则更多地表现出维护与完善封建制度的愿望。但两者均不失为合时合宜的、其所处时代所可能提供的最佳选择。而从本质上看,两者更是君子之见和而不同,皆在追求社会的长治久安与和谐发展。

一如当今成熟的国际企业重大决策必分别组织,同时并出可行性论证与不可行性论证一般。一味强调“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与“以史为鉴,止欲叙国家之兴衰,著生民之休戚”之不同,^①无疑为弃本而逐末。考虑两者在本质上的统一,不宜认为两司马在史识上有明显的高下之分。

随着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学术氛围日益开放,和谐社会建设成为时代发展的主旋律,有必要重新审视和发掘司马光《通鉴》及其史论的核心思想与价值。

吾师周国林先生在其主编的《白话资治通鉴》前言中高度评价了《通鉴》的史学成就,认为:“司马光的历史观未必能被今人苟同,但书中记人则神采飞扬,栩栩如生,呼之即出;叙事则词采纵横,汪洋恣肆;抒发心怀清穆穆如,长歌慷慨;渲染征战则意气飞扬,一泻千里。辞彩华美逊于齐梁,文风骨气直逼两汉。其内容思想博大精深,求实考信,通古今之变,兼收并蓄,拾遗补阙,考评兴衰得失于前世,镜鉴往昔当今于后人,实为一部皇皇大书。”其论《通鉴》史论曰:“虽然其间也有今日看来失当甚至陈腐平庸的见解,但却绝无凿空立论、无病呻吟之弊,是读者可以特别留意之处。”^②既认识到司马光思想的博大精深,亦看到司马光历史观未必被今人苟同,适有深入发掘与研究之必要。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通鉴》研究不断深入,已蔚成学术之林,然就《通鉴》史论研究领域考察,虽间有新作问世,却多为零星的碎片式研究,亦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用功不足,文献采摭片面,主观性过强,唯取合意,不顾其余诸弊端,缺乏具有系统理论指导的

① 俞文冉、陈乃宣:《两司马治史之比较研究》,《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1年第6期。

② 周国林、顾志华:《白话资治通鉴》,周国林撰“前言”,岳麓书社2005年版。